



体育史料

中国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第十輯

出版社

· 第十辑 ·

体育史料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目 录

华北运动会的由来及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	郑一民(1)
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校史	陈景虞 陈镇华 董承良整理(7)
上海私立东亚体专校歌.....	宣智杰 马友于(19)
旧中国第二届国术国考.....	彭政蒲 丁非杰整理(20)
西北联大体育简况.....	王增明整理(28)
南宁解放前的体育活动概况.....	雷 成(34)
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的组织情况.....	沙瑞辰(44)
武林旧事.....	金 鼎(48)
天津足球运动史话.....	刘世藩(54)
解放前江西体育学校简况.....	张允建(62)
回忆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	王毅诚(67)
中国体操学校章程.....	储剑虹 钟瑞秋(74)
我的回忆.....	徐绍武(78)
注重身体锻炼的西北军.....	肖 雅(83)
我在中大体育系生活片断.....	张汇兰(85)
江苏省立江宁师范简况.....	邹彬芳(88)
解放前广东省省运会简况.....	曾绍胜(90)
张效良教授与体育.....	福建体院杨国卿(92)
河北省体育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主要工作.....	郑一民(97)

解放前中大体育系简况.....	曾绍胜(100)
青海体育史初探（近代部分）	
.....	青海师院体育系 方协邦(102)

华北运动会的由来及第十八届 华北运动会

郑 一 民

清末，近代体育运动逐渐传入我国。

北京是我国文明的古都，天津是当时著名的工商城市和通商口岸，文化教育发达，加之一些爱国人士倡导，所以打球、做操、练拳、跑跳等各项体育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他们不仅在校内锻炼，而且走向社会开展校际比赛。其中北京清华学校，通州协和书院，北京汇文学校三校的对抗赛影响较大。他们从1912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比赛，一直到1916年，共举行过五次。后来，协和、汇文两校合并，原来的三校对抗赛改为清华、北京高师和汇文三校的新的三角对抗赛。在天津，南开中学，天津工业学校，天津青年会日校等学校，也经常开展田径和球类比赛。当时的新闻界对体育竞赛活动进行了宣传，如《世界日报》、《晨报》等，每天均在报刊上辟有“体育界”专栏消息。京、津地区这种学校间自发的体育竞赛活动，成为华北运动会的萌芽。

随着比赛的开展和体育活动的普及，运动水平不断提高，选手们渴望能同更多的强手较量。因此，他们对单纯的校际比赛或只在本地比赛，已感到不能满足要求。于是，1913年春，由北京的三角运动会和天津的学校运动会联合发起，邀请东北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天津青年会、北平青年会等当时我国北方的一些体育活动开展好的学校和组织派代表

参加，在社会名流支持和倡导下，组织成立了华北体育联合会。联合会设有主任和理事，主任为张伯苓，理事有董守义、袁敦礼、马约翰等。会议决定：华北体育联合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进行田径和球类等各种比赛，讨论决定下届运动会举办和召开年会的地点等。首届运动会于1913年在北平召开，邀请了外地代表队参加或观摩，定名为“华北运动会”。

华北体育运动联合会的成立，促进了我国北方体育运动的交流和发展。它初建时，虽然只有北平、天津和一些华北地区当时闻名的学校、组织派代表参加，但很快发展成为包括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大部分省份参加的统一的体育组织。运动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扩大后的华北体育联合会，主任是张伯苓，理事有董守义、马约翰、袁敦礼、傅镜如（天津）、李洲（北平）、赵文藻（河北）、尚树梅（山东）、张贻先（青岛）、宏瑞智（陕西）、王卓然（东北）、胡安善（东北），以及河南、察哈尔、绥远等省的代表（名字不详）。

自1913年至1934年，共举行过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初为校际比赛，分为大学组和中学组，从1931年起，因为参加运动会的学校越来越多，改为以省、市为单位派代表队参加比赛。比赛地点除北平、天津外，还有沈阳、开封、济南、太原、青岛等地。参加的单位有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察哈尔、绥远等省、市。所以，它的名字虽然叫华北运动会，其规模远远超出了华北地区。在我国近代体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是1934年10月在当时河北省省会

天津市举行的。

1932年，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由于青岛市长沈鸿烈重视，规模较大，运动员达两千余人。在运动会进行中，华北体育联合会举行例会时，各省代表商讨了下届运动会会址。当时河北省体育委员会已成立，很希望能通过举办大型运动会来推动河北体育运动的发展，担任大会总裁判的张伯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负责人、华北体育联合会主任、南开学校校长、河北省体育委员会成员），在会上提出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河北省省会天津市举行。与会的人中，虽然有人担心河北没有承担这一任务的条件，但碍于张伯苓当时在全国体育界的威望，不好直言，会后决定让河北代表团回去同省府商量一下再定。

参加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的河北领队为赵文藻（即赵亚夫），回省后向当时担任省教育厅厅长、河北省体育委员会主任的陈宝泉进行了汇报。张伯苓先生，也为此到省、市各界四处奔走呼吁。他找到当时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于学舟说：“举行这么大的运动会，没有体育场哪行？最好能借此建个场子……。”于学舟，原是东北军的一位爱国将领，很支持青年学生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对张伯苓的意见很重视，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由省政府筹款20万元，天津市筹款20万元，共40万元，为建设体育场和筹备举行华北运动会用。

于是，河北省教育厅和河北省体育委员会抽调了专门班子主持这项工作。负责人有赵文藻、董怡如等。陈文煌为建场技术干事，负责现场监工。工程由当时天津市著名的天津基泰工程公司承包，经理为关颂声。建筑材料和施工费计24万元。场地勘定在天津市北站北宁公园北，征购300多亩土

地，那里除了稻田就是坑洼，需要运土垫高，深的地方需垫一丈二尺多高，这两项用款八万元。剩下的八万元为筹备和举办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的资金。

新建的体育场为钢筋水泥结构，内有500米圈的跑道，可供篮、排、足、网球、棒垒球、投掷等项目比赛的场地和设施。周围有可容8万观众的十八级看台和一个主席台，看台下为可供运动员居住的宿舍。正门雄伟壮观，用涂金大字书写着：“河北体育场”。场外还有一些做准备活动和进行练习的场地。这样大规模的体育设施，当时在国内还是不多见的。

1934年10月，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这个新建的河北体育场举行，各省参加的运动员有二千五百多人，是华北运动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开幕那天，体育场看台高处，彩旗招展。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舟担任大会主席，张伯苓为总裁判，总干事为袁敦礼，副总干事为赵文藻、董守义等。省、市的一些显贵要人多坐在主席台上。各国驻天津的领事等也应邀参加。场上座无虚席，情景十分热闹。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比赛项目以田径为主，也有篮球、排球、足球、网球、棒垒球和武术等。在这届运动会上，焦玉莲创全国女子100米短跑纪录，成绩13秒2；北平队以28秒6的成绩平全国女子200米接力赛纪录；白春育创全国男子12磅铅球纪录，成绩是14.292米。河北省参加这届运动会的男女运动员，多达150余人，并参加了所有项目的比赛，赵文藻为领队。

在开幕式上，由天津市各小学学生表演了团体操，中学生表演了女生舞蹈，河北国术馆组织、表演了武术，省政府保安队，在开幕式上表演了劈刺等军事项目。

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是天津广大青年学生和东北运动员所表现的爱国激情。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我们东北和华北一些重要城镇，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帝国主义侵略者得以在中国横行。广大爱国群众，对内外反动派互相勾结，把中华民族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早已义愤填膺。在这次运动会之前，天津地下党已组织青年爱国学生做好了宣传动员民众的准备。当东北运动员刘长春、白春育等（这些运动员都是流亡在平、津的爱国青年）举着白底黑字、上书东北三省名字的旗帜，沉痛地步入会场时，千万名观众压抑已久的愤怒从心中爆发了。与此同时，在主席台对面东看台上，以南开学校和天津市各校青年学生组成的图案队，用黑白两色组成了醒目的宣传抗日爱国的巨幅标语：“勿忘九·一八”，“勿忘东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负责组字指挥的是南开学校进步学生严仁颖。愤怒的群众，看到爱国的青年学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少人，一边拍手叫好，一边高呼：“还我东北”，“抗日救国”等口号。刹时，将一个体育运动会，变成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大会！

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观众和运动员、裁判员的同情和支持，也激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当时日本驻天津最高长官梅津，正洋洋得意地坐在“贵宾”席上观看表演，忽然看到爱国学生在主席台对面看台上组成的抗日标语，听到群众愤怒地高呼抗日口号，大发雷霆。他气势汹汹地找到大会主持人张伯苓先生，提出抗议，说：这是破坏“中日善邻友好”，“经济提携”。要求立即制止，追查责任，捉拿肇事者。张伯苓先生拒理争辩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梅津无奈又找到于学舟，责问是谁干的。要负一切后果。但仍没得到满意的答复。

华北运动会上点燃的抗日爱国烈火大长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志气，消息传开，国人无不为之振奋！

事后，梅津将这件事直接告到南京政府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肇事者。一向惧怕日本武力的卖国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竟甘当走狗，下令撤了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舟，省教育厅厅长陈宝泉等人的职务。不久，又强令河北省将省会搬往保定，派商震为省长，周炳林为教育厅厅长。爱国学生严仁颖，为了逃避追捕，前往美国留学，后曾任大公报主编。

十八届华北运动会闭幕前决定，1937年在北平举行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但是，正当北平各界人民为迎接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而兴建北平先农坛体育场过程中，“七·七”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十九届华北运动会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夭折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报复爱国学生和天津市各界人民的抗日怒潮，派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将图书馆、教学大楼等几乎夷为平地，并将座落在天津金钢桥畔的原河北省政府办公大楼炸毁。

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校史

东亚体专创立于1918年8月。创办人为留日学体育归国的江苏常熟人庞醒跃。他主张，提倡体育必须创办体育学校，培养体育师资，方能达到增强国民体魄，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目的。经中国体操学校毕业生傅球（朗斋）和史忍（济群）的赞同与支持，庞不惜变卖祖遗家产，筹措经费，开办斯校。

建校伊始，又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环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上海南市体育场场长王壮飞、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陈梦渔等社会知名人士的赞助，并请朱少屏兼任名誉校长。庞醒跃任学校主事，实际执行校长职务。傅球担任教务，史忍任总务，组成精干的办学机构。

1918年春，体专租赁上海方斜路庆安里，前体育传习所旧址为校舍。同年暑期，接受中国体操学校一、二年级几十名学生为东亚体专的第一批学生，并定二年级学生为第一届，一年级为第二届。同时又招收三十余名学生为第三届。此后每年寒、暑假各招生一届，每届三十至五十名不等。学生来源有全国各省、市的中学生与南洋华侨子弟。1921年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报准立案。由于社会需要，以后又附设高中体育师范科。

学校初创阶段，场地设备因陋就简，在仅有一块人字形空地的西边建成篮、排、垒球三项共用的球场，球场西面设

一铅球投掷区，南面设一跳高、跳远、撑竿跳高区以及单、双杠兼用的沙坑；东南边搭建芦篷一座，作为雨天操场。芦篷一边存放运动器材。需用较大场地的运动项目，如径赛和铁饼、标枪以及足球运动等，借用学校附近的南市公共体育场上课。

建校初期，课程门类较少。学科开设国文、英文、生理学、解剖学、人体测量学、体育哲理与管理、运动裁判法和音乐等；术科开设田径、球类（包括篮、足、排、垒球）、国术、器械体操（单杠、双杠、木马、跳箱、平台等）、普通体操（包括徒手、球杆、哑铃、棍棒操等）和舞蹈。聘请我国著名的体育家董守义和体育界知名人士王壮飞、马振亚、徐希一、孙和宾、邹彬芳等任教。

当时国内体育学校，一般偏重运动技艺，忽视学理研究，常有人诟辱学体育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庞主事力主学、术并重和培养学生体育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努力钻研学、术理论，多写文章。他自己先后撰写《体育哲理》、

《体育管理》两本著作，供学生学习。在庞主事的影响下，学生亦不断撰写文章在上海申报教育与体育栏发表。1924年邹彬芳写的《我国田径运动为什么开展不起来》一文在该栏发表后，获得良好反响。

1919年12月，以上海东亚体专编辑部名义，出版十六开本的“东亚体专校刊”，内容有体育教材教法、音乐、图画、论述、研究以及报道学校各项措施和各地毕业生状况等。该刊文章为学校师生合写，供在校学生课外进修参考，校外亦可订阅。当时为国内闻名的综合性体育刊物之一。1923年7月出版第四期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学校为促进学生技术水平的提高，每学期都安排各类比

赛。项目为足球、篮球、排球、垒球和田径、国术六种。每学期按照季节安排比赛项目，规定各班学生必须按时参加比赛。

为培养学生体育实践能力，庞主事在体操教学进入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时，每次课均安排两名学生试教，教材由学生自编，课毕依据学生试教情况给予讲评。此外，还安排学生到本市一些中学看经验丰富的体育教师上课，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如到澄衷中学观摩著名体育老师王怀琪的三段教学法以及走步中多种队形变化。这些措施，一时传为“师法”。庞主事还经常关心经验不足的教师上课，并向他们提供改进教学的意见。如上田径课，他提出应多采用分解动作技术的教学法，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要领；还设置教学意见箱，让学生对学、术科教学提出意见和要求。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创举。

学校对各项运动裁判的实习也很重视，每学年分别安排学生担任校内各项比赛的裁判职务（主要裁判除外），并与南市公共体育场约定：凡该场举行的各项比赛，如可供学生实习裁判的，均由学校指派合适学生担任，借以培养学生各种裁判能力，还争取到各地区协助举办运动会。如南汇、昆山等县举行田径运动会时，竞赛的编排记录、场地布置和裁判工作，都由田径教师指导学生分别担任，使学生得到全面实习的机会。

自1918年至1927年十年期间，庞主事艰苦办学，费尽心机，招生二十一届，培养师资六百余人，遍布全国各省、市，为东亚体专在全国博得一定声望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庞在执掌校务期间，学校经费得不到当时政府的补助，加以连年新旧军阀内战，交通阻塞，影响学生来源，学费收入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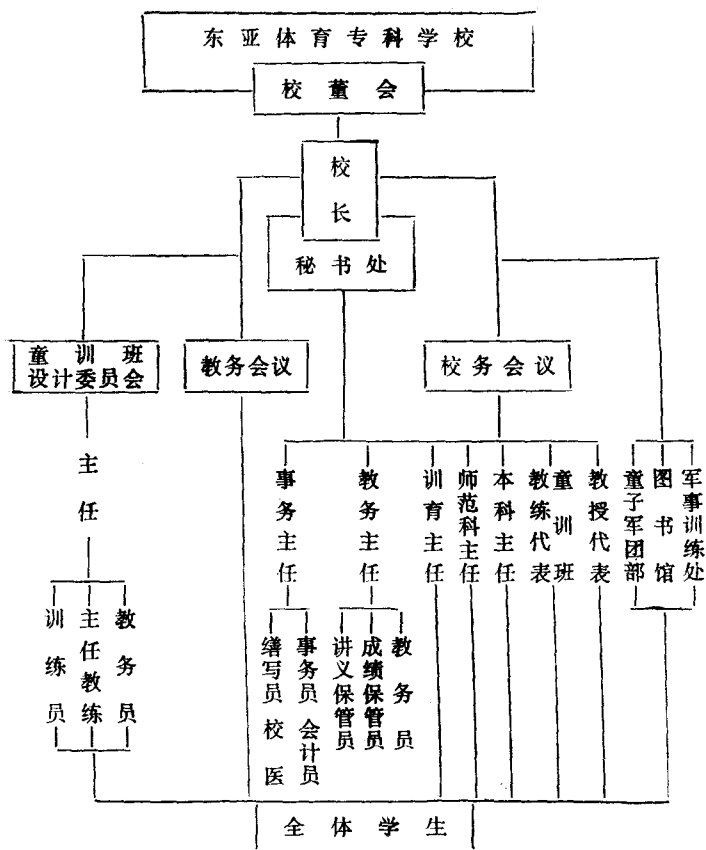
减，庞主事虽耗尽家财，还是负债累累，困扰无以脱身，迫不得已，于是年端午节前夕留言离校，不知去向，全校师生无不为之怀念与悲痛！

1927年夏庞主事离校后，由宗肖鹏、陈梦渔和毕业留校任教的校友徐希一、孙和宾等四人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推宗肖鹏任校长。1929年宗病逝后，由陈梦渔继任，并请储伯勉任校长办公室主任。

陈掌校务后，全国各地学生要求来沪报考入学者逐年增加，此时各地普遍需要体育师资所使然，原有校舍设备已不敷应用，陈遂多方设法筹募资金，于1928年勘定的上海卢家湾鲁班路草圻街新校址上，兴建西式教室楼房一座，宿舍楼三座，健身房一座，雨天操场一座，简易田径场包括足球场一片，篮、排球场四片和器械体操区等，作为男子部校舍。女子部仍留方斜路。1931年复增建宿舍楼、图书馆、游泳池各一座。1935年将女子部并入男子部。校内各种教学设备仪器用具逐步添置完备，足供应用。

在陈校长兴建学校时期，校董会聘请邵力子为主席，李培天为校董，并重申培养品德高尚、学、术兼优体育人才的办学宗旨，强调学、术科要平衡发展，既要重视学科修养，又要加强运动训练与教法研究，以适应推行体育之急需。

1930年校董会决定将体育师范科改称为体育师范学校，学制三年，招收初中毕业生，以符合当时政府规定的学制和名称。为适应各地初中对童子军教练员的需要，又附设一年制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每年招收四十至五十名。1931年在校学生总数已达五百余人。学校已建立起较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如表：



学校课程设置，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充实，并参照欧美体育系科课程设置进行调整，使之日趋完善。

本科：开设国文、英文、运动生理学、人体解剖学、教育学、伦理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原理、体育行政、人体测量学、体育建筑与设备、按摩术与矫正操、体育教育法、体

育史、运动裁判法、田径、器械体操、徒手体操、球类、游泳、国术、韵律活动、音乐等等。

师范科：除开设小学教育概论外，余同本科课目，惟内容较少而浅易。

童训班：开设旗语、救护、露营、气象、星象、游泳以及中学体育所必需的运动项目，体育概论、体育教学法等课程。

从学校创办到停办，先后来校任教的教师，除上述体育界名流外，聘请的教授和专家还有：蒋湘青、程登科、高梓、董承康、周尚、朱国福、陆礼华、秦醒世、邵汝干、钱挹青、许开甫、路佛山、乐患知、瞿越、佟忠义、徐家增、江良规、俞晋祥、朱荣年、赵慰祖、彭振球和孙移新等。

根据当时培养体育实用人材的要求，本科、师范科和童训班教师，均分别编写讲义发给学生。讲义经试用成书出版的有：

蒋湘青的《人体测量学》（上海勤奋书局出版）、《田径运动ABC》（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孙和宾的《怎样办理体育场》（南京书店出版）、《柔软体操基本动作图解》、《柔软体操六十部》、《体育行政》、《体育教学法》。

董承康的《田径教学法》。

瞿越的《体育史》、《女子篮球规则纲要》。

钱挹青的《人体解剖学》。

乐患知的《英文读本》。

陈梦渔的《童子军手册》（上海三民书店出版）。

赵慰祖的《童子军星象》、《气象专科》、《营地工程》、《旗语》。

孙移新的《游泳初步练习法》、《急救法图解》（上海少年用品供应社印行）。

以上未注明出版书店的，均由学校图书资料发行所出版。

教务处对各科教学进程执行情况，每月调查一次，并将调查结果通知教师，促使其尽力于教学工作，并不定期地聘请体育界名流作学术讲演。如邀请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作有关武术运动的专题报告等。

课外各门术科练习，每学期作如下安排：9—11月份以足球为主，11—1月份以篮球为主，4—6月份以棒、垒球为主。校运动会每学期举行一次，学生必须参加比赛，无故不参加者，不得升级或毕业。学校各项运动代表队，每学期初调整一次，促使学生精练技术。校器械体操队常到沪市各区表演，深受欢迎。球类、田径校队经常参加校际间对抗赛，各项杯赛并赴外省市进行表演比赛。如1935年江西教育厅邀请校女子田径队参加该省第一届女子田径运动会，作田径表演赛，在回沪路经安庆时，安徽教育厅又邀请表演。这些竞赛表演，都取得了良好反响。

1935年，校女子篮、排球队应新加坡篮、排球总会邀请出国远征，在路经西贡和新加坡的比赛中，受到当地侨胞与民众的欢迎。当西贡提岸与新加坡举行田径运动会时，还邀请队员参加田径表演，风声所播，吉隆坡、槟榔屿、柔佛、太平、吗喀巴哈等地民众体育团体纷纷邀约比赛，在这些活动中，受到各界侨胞热情接待。

在旧中国的艰难岁月里，学校不少学生为了改变当时体育运动成绩的落后状况，自强不息，创造多项全国田径运动纪录。